

马克思幸福观的历史演进： 从《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李水石, 秦 龙

(大连海事大学, 辽宁 大连 116026)

摘 要:追求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是马克思一生为之的奋斗目标。从黑格尔自我意识的纯粹精神幸福到伊壁鸠鲁具有现实偶然性的实践幸福,从主张资产阶级政治革命的革命民主主义者到为人类解放与幸福振臂高呼的无产阶级革命斗士,从揭示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不幸福的根源到历史唯物主义幸福观的最终诞生,马克思幸福观的形成经历了一个复杂的演变过程,每一次转变都与其哲学思想体系的发展紧密相扣。

关键词:马克思;幸福观;历史演进

中图分类号:A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359(2014)01-0047-05

作者简介:李水石(1981—),男,河南安阳人,大连海事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秦龙(1973—),男,辽宁锦州人,大连海事大学公共管理与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公共哲学与社会发展问题研究。

在价值观多元化的 21 世纪,揭示和认识马克思幸福观对于实现人民幸福、促进社会和谐有着重要的意义。近年来国内外对马克思幸福观的研究,主要是以高度概括的马克思幸福观基本内涵为理论基础展开的。但马克思幸福观的形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伴随其世界观,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发展而经历了一个复杂而艰辛的过程。马克思没有专门撰写关于幸福的专著,其全部思想学说的宗旨都是为了全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可以说全部的马克思主义都在论述他的幸福思想,因此我们无法像研究其他思想家那样直接、系统地了解马克思的幸福观。但我们有必要详细梳理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发展形成的历史过程,深刻剖析其思想转变的动因,从中寻找马克思幸福观演变的内在逻辑,才能更准确、更全面地理

解马克思的幸福观。

一、《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神性崇拜下的理想主义幸福

少年时代的马克思,受到家庭浓厚的宗教氛围和自由主义、理性主义盛行的社会环境的双重影响,在其中学毕业论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以下简称《考虑》)一文中便表现出对人类幸福问题的深切关注,显示了马克思卓越超群的人生理想,是其幸福观最初的萌芽状态。

马克思在《考虑》开篇就指出:“自然本身给动物规定了它应该遵循的活动范围,动物也就安分地在这个范围内活动……神也给人指定了共同的目标——使人类和他自己趋于高尚,但是,神要人自己去寻找可以达到这个目标的手段;神让人在社会上

收稿日期:2013-09-08

基金项目: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项目(NCET-11-0862)

选择一个最适合于他、最能使他和社会变得高尚的地位。”^{[1]455} 马克思认为人应该选择合适、高尚的职业。这种自主选择意识与能力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特有属性。但由于对神性的崇拜,在中学时代的马克思眼中,这种自我选择的动因不是人类自己,而是对神性的追求。人只有在上帝的指引下才能实现其自身的特有属性,才有可能被社会认可,成为幸福的人。

同传统基督教消极、厌世的幸福思想不同的是,马克思并没有将来世的幸福作为人生的目标和价值判断的标准。在他看来,职业的选择应该遵从神性的启示,但神性不是人性的最终归宿,基督教教义也不是人类行为的终极评判标准,而是一种超越现实道德的具有启发性的道德指引。人应该把握自己的命运,通过高尚的工作、为他人谋幸福的行为和无畏的牺牲精神获得属于自己的现实幸福。

中学时代的马克思虽然已经确立了追求人类幸福这一伟大理想,但他把人生幸福的获得寄托于神性的启发和指引,这说明此时的马克思从根本上并没有摆脱宗教哲学的影响和束缚,此时他的幸福思想是一种充满自由幻想的理想主义幸福观。尽管如此,其思想中仍蕴含着由神性走向人性的端倪,蕴含着对于人类自身命运和幸福的关切,蕴含着对人类选择自身道路的追求与向往。无论从任何意义上讲,对于一个处在中学时代的少年,这都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这正是马克思矢志不渝追求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开端,也由此开始并最终形成了以实现全人类幸福为终极旨向的幸福观。

二、博士论文——自我意识的偶然性幸福

自我意识哲学是马克思第一个独立的世界观。在青年黑格尔派追求个性自由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下,马克思在其博士论文中,通过对希腊后期哲学的研判,突破了自我意识哲学的抽象性,找到了自我意识与现实世界的联系,将自我意识转化为意志力量和现实行动,并希望以此来改造当时德国的政治与社会现状。

马克思认为原子偏斜运动是伊壁鸠鲁和德谟克利特在自然哲学方面的根本区别。原子脱离直线的偏斜运动意味着原子脱离了自己的预设轨迹,实现其质的整体性和自为自在的独立性,完成了自我否定。偏斜运动证明了“德谟克利特使用必然性,伊壁鸠鲁使用偶然”^{[1]27} 这一对立的哲学思想,进而折射出其中深刻的人学本质,那就是失去了否定,人就将在必然性的宿命轨迹中被自我扬弃,只有在偶然性

中人才能实现自我否定,实现定在中的自由。

马克思认为,如果现实世界只存在必然性,那么人将丧失对自己命运的掌握,丧失自我意识和自我存在,沦为宿命的奴隶。只有当偶然性成为世界运行的基本法则,人才有在偶然性中自由选择的机会,才能具备自我意识,成为独立的存在,才有追求幸福的基础和可能。偶然性的存在使人类有了打破命运束缚的可能性,使人类看到了同一切禁锢自我意识和自由意志的桎梏斗争胜利的曙光。这种打破,这种斗争就是“在物质的形态下同抽象的物质作斗争的抽象形式,就是自我意识本身”^{[1]61}。而自我意识的确证就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人对自身命运的掌握,就是人的自由发展与人性的解放。同时,马克思还指出,人不是孤立地存在,要实现自由和幸福,就不能将人同社会环境割裂开来。人类真正的幸福应该从伊壁鸠鲁的精神幸福走向现实幸福,从个体的抽象幸福走向普遍的现实幸福,从无声的、自我保护的幸福走向现实的、斗争的幸福。只有从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作用的角度来考察人、研究人,才能找到真正的通往自由与幸福的道路。

通过对马克思博士论文的研读,我们可以看出此时马克思所谓的自我意识已经不是黑格尔抽象的、纯粹精神的自我意识。但马克思还没有将人还原回其真正的本质,还没有跳出黑格尔唯心主义的立场。即便如此,马克思对人类幸福的关注点已经从纯粹的精神幸福转向了具有现实偶然性的实践幸福,这一转变为马克思幸福观的进一步发展拉开了序幕。

三、《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市民社会的现实幸福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以下简称《批判》)是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进行批判的第一部著作,也是马克思离开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哲学、开始其哲学思想转变得开端。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用唯物主义思想改造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法哲学本体论,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辩证法,开辟了马克思通往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上。

《批判》的主要内容围绕市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展开。在黑格尔那里,国家作为绝对理念的精神体现,将自己划分为家庭和市民社会。家庭和市民社会是从属于国家理念的有限的非理性领域,其对立和矛盾存在于理念中,最终也必将在逻辑理念的发展之中相互融合,实现辩证统一。马克思指出,黑格尔唯心主义国家观的实质是泛神秘主义和泛逻辑主

义,是颠倒事物的现实关系。黑格尔“不是从对象中发展自己的思想,而是按照自身已经形成的并且是在抽象的逻辑领域中已经形成的思维来发展自己的对象”^{[2]18-19}。马克思认为,家庭和市民社会构成了国家,决定了国家,是国家真正的活动者和原动力。黑格尔认识到了政治社会和市民社会的二分对立,也试图来解决这种矛盾,这一思想无疑是深刻的。但受到自身政治立场和哲学思想的影响,“黑格尔在设定两者的关系时,虽然表面上也主张二者的对立,但实质上更偏重于二者的同一,他总是试图用官僚政治去消除国家和市民社会的分裂”^[3],总是试图在观念中实现矛盾双方的统一,这无疑是难以成功的。在马克思看来,市民社会和国家是无法调和的对立,不可能在国家理念内部实现统一。君主立宪制度和议会制度是以私人利益为核心的国家体制,与应该代表普遍利益的国家理念从本质上是对立的。统治阶级维护政治国家的目的就是利用政治工具,在经济上钳制市民社会,以维护自己的政治和经济特权。要实现市民社会经济上、政治上的普遍利益,解决市民社会的内部矛盾和市民社会与政治国家之间的矛盾,就不能在政治国家内部寻找答案,而是应该从市民社会出发,依靠市民社会本身的力量去实现。

从《批判》中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已经开始了向辩证唯物主义的转变,也能找到一些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但其对人的本质的认识仍没有跳出黑格尔国家哲学的框架,并没有发现“打破一切旧枷锁”的真正力量,没有发现在经济政治二分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此时的马克思仍是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仍旧希望在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体制的范围内通过社会变革实现人类的解放与幸福。尽管如此,第一次哲学思想的转变已经使马克思跳出了自我意识的精神范畴,开始从人的实际存在方式,也就是社会关系的角度去考察人、研究人的幸福。

四、《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无产阶级的此岸幸福

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以下简称《导言》)中提出了只有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才能实现人的自由与全面解放等一系列接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导言》是马克思幸福观发展道路上重要的里程碑,是其思想理论上一次重大的飞跃。

《导言》首先从宗教批判入手。马克思认为宗教作为德国封建制度的精神支柱,麻醉了人的批判能

力和行动能力。要作出对现实世界的全面批判,就必须首先消除这种精神“鸦片”对人类的荼毒,打破宗教神学对人类自我意识的桎梏。

在确定宗教批判作为其他一切批判的基础之后,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不是批判的最终目的。既然宗教是扭曲的现实世界的映射,那么对宗教的批判就应该转向对扭曲的现实世界的批判;既然虚幻的宗教天国已经破灭,那么哲学的历史任务就应该是建立现实世界的真实生活。“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2]200}。政治制度上的全面落后迫使德国必须进行彻底的变革,必须要彻底消灭现行的政治体制。

同时,马克思认为不仅应该批判德国的现存社会政治制度,还应该上升到理论层面批判这种制度的抽象继续,也就是对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进行批判。其原因有二:首先,人类的真正解放不可能在政治批判和政治解放下,人类最终的解放是“使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回归于人自身”^{[2]189}。其次就在于当时的德国处于“时代错乱”。在德国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变革是在先进国家早已发生过的变革的历史重演。要取得历史的制高点,就必须跨越德国的错乱时代,到时代文明的顶峰去探寻和实践。对德国来讲,这一顶峰就是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黑格尔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是德国国家制度的本质表现,也是德国制度缺陷的集中体现。对黑格尔国家哲学和法哲学的批判,是对当时德国唯一具有现实意义的批判。黑格尔哲学的致命弱点就在于它是一种纯粹的抽象哲学。哲学源于现实,高于现实,服务于现实,与现实相互作用。哲学应该走出狭隘的、自我封闭的思辨怪圈,走向现实,走向实践。“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2]207}。现实的敌人只能用现实的力量来摧毁,实践哲学就是这样一种现实力量,哲学的任务“不是要驳倒这个敌人,而是要消灭这个敌人”^{[2]203}。

最后,马克思认为,革命斗争的实践主体和现实力量只能是无产阶级。在马克思眼中,“这个特殊的阶级既是当下被戴上锁链的被压迫阶级,更是一个时代的人和代表时代的象征符号”^[4]。无产阶级是社会的最底层,他们遭受普遍的不公正待遇和阶级压迫,与国家制度处于全面的对立,因此无产阶级不存在狭隘的利己主义束缚,他们的革命性最坚定也最彻底。因此马克思坚信,实现全人类解放与幸福的彻底革命,资产阶级革命做不到,市民社会的政治

革命也做不到,只有无产阶级能够将自己从一切社会领域中解放出来,同时解放一切社会领域,解放自己。

相对于《批判》,《导言》中提出的一些观点表明了马克思在转向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道路上更进了一步,但距离科学社会主义的最终形成仍有一定差距。首先,马克思没有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确立无产阶级意识形态绝对导向的重要性。其次,马克思认为德国可以跨越资产阶级革命直接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观点并不符合德国社会发展的实际进程。再次,马克思还没有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去认识人的本质。最后,经济批判的缺失表明了马克思还没有认识到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尽管如此,我们已经可以隐约看到马克思幸福观的基本雏形,那就是由无产阶级领导和实现的全人类解放。

五、《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人的类本质的复归

《1844 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通过对国家经济学和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的批判以及对劳动异化的论述,分析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下人不幸福的根源。为无产阶级解放全人类,实现人类幸福的革命任务找到了理论依据和现实出路。

异化劳动是《手稿》的核心概念,马克思从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三个方面深刻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异化劳动的表现形式、成因以及异化劳动和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对立关系,揭示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工人的实际生存状态。异化劳动并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独有产物,它是人类物质生产活动发展的一个必然阶段。人类在进入阶级社会后,劳动分工和阶级分化导致了人的精神力量和肉体力量的分离,统治阶级进行脑力劳动,广大的被统治阶级为了满足生存的物质需求被迫从事体力劳动,异化劳动随之产生。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市场环境更加开放,前资本主义社会相对封闭的自给自足式的家庭生产单位被打破,劳动产品进入一个更为广阔的市场进行交换,劳动者失去了对劳动产品交换过程的控制,劳动与需求之间的直接联系由于交换链条的拉长而变得更加复杂。伴随着工资的介入,劳动成为一种商品,成为一种劳动者赖以谋生的工具性活动,资本取代劳动者成为劳动的实际拥有者。伴随着生产力的空前发展,异化劳动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了历史的顶峰。

异化状态下,人是不幸的。在异化劳动中陷入

贫困的劳动者为了维持生存,不得不从事摧残自我身心的强制性活动。劳动者不仅同自己的劳动产品、劳动本身相异化,也同自己的类本质、同他人相异化。要实现人的幸福,就必须将人从异化中解放出来,还原人的本质,使劳动成为人自由自觉、有目的有意识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成为人的生命活动的基本形式。只有这样,人才能通过劳动表现其特有的类特性,完成其本质的复归。为了实现人类的解放与幸福,马克思从经济学和哲学两个角度探讨了异化扬弃的实现途径。从经济学角度出发,异化的扬弃就是对私有制的积极扬弃;从哲学角度出发,异化的扬弃就是实现人的本质的复归和全面发展。这两条途径相辅相成,高度统一,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方面,而这一历史进程就是共产主义的实现。“共产主义是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的扬弃,因而是通过人并且为了人而对人的本质的真正占有;因此,它是人向自身、向社会的即合乎人性的人的复归,这种复归是完全的,自觉的和在以往发展的全部财富的范围内生成的”^{[2]276}。《手稿》中马克思提出的共产主义构想是一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社会政治方案,其根本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这个构想,“不是任何人主观臆造出来的,而是私有财产自身矛盾运动的必然产物,有它自己的客观的经济基础”^[5]。在这种社会制度下,每个人都能充分、自由地发挥和发展自己的能力,全面占有其自身和社会本质。

作为马克思哲学思想体系以及幸福观形成过程中承前启后的一部著作,《手稿》虽然仍带有很多旧哲学的痕迹,但马克思提出和论述了一系列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理论。从总体上看,《手稿》中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内容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并且在不断充实、深化,此时的马克思已经处于其哲学思想体系基本形成的破晓时分。

六、《德意志意识形态》——现实的个人的全面发展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系统清算了青年黑格尔派唯心主义哲学和费尔巴哈人本主义哲学对他的影响,完全摆脱了黑格尔思辨唯心主义的局限性,彻底划清了与以往一切旧哲学的界线,首次系统阐述了唯物史观的一系列基本原理。唯物史观的诞生标志着马克思幸福观的最终形成。

“现实的个人”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幸福观与其之前幸福思想最根本的区别,也是其唯物史观的

出发点和理论基础。在旧哲学那里,历史的发展独立于人类生活的现实世界,亦或者是人类自我意识的反映和延续。而马克思认为,人类历史的基础和创造者是“现实的个人”。人作为现实的存在,必须进行物质资料的生产活动以满足其基本的生存需求。人在通过实践活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不断发展其自身的特性以满足更深入、更广泛的改造自然的需要。在这个过程中,人的内在特性和外在自然界相互制约,相互作用,实践的人和物化的自然互为对象。在需求与满足、制约与发展、作用与反作用这些关系的影响下,人一方面通过改造自然满足了生存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完成了自我发展和自我确证。同时,“现实的个人”不是孤立的存在,而是既处于一定社会关系之中的社会性存在,又处于一定的历史关系之中的历史性存在;既横向与现实世界发生联系,又纵向依据历史条件发展变化。探求现实的人及人类历史的发展过程,就不能局限于人与自然的关系,而是应该进一步深入到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之中。至此,我们可以总结出马克思在《形态》中对人的本质的规定:“现实的个人”是存在于一定社会关系中、一定历史条件下、从事感性实践活动的有生命的人。

在确立了人的本质之后,马克思定义了“现实的个人”的幸福状态——真实的集体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真实的集体是在生产力充分发展的前提下

的自由人联合体,这种联合不是出于外力强迫和生存需要,而是一种自主的联合。“只有在集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6]。真实的集体建立在公平合理的社会基础和价值基础之上,一方面真实的集体中不存在阶级对抗和利益冲突,集体成员之间相互平等,共同占有生产资料 and 一切生产力的总和;另一方面真实的集体可以代表大多数集体成员的普遍利益和价值追求,能够为集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提供条件,而集体成员的自由全面发展也能动地促进了真实的集体的进一步发展,这种协调统一的共生关系推动了整个社会的进步和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

在《形态》中,马克思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将“现实的个人”理解为人的本质,将真实的集体中个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定义为人类幸福的最佳状态,将通过无产阶级领导的共产主义革命实践作为通往人类解放的现实途径,将共产主义社会视作人类实现真正幸福的唯一可能,这一切都表明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幸福观的最终形成。这种幸福观,是人类实现自我本质与社会历史进步的实践的幸福观,是协调自身全面发展与社会关系全面丰富的辩证的幸福观,是兼顾集体利益与个人利益的科学的幸福观。在这种幸福观的指导下,人类必将实现真正的幸福。

[1]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3]韩立新. 从国家到市民社会:马克思思想的重要转变——以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为研究中心[J]. 河北学刊,2009(1).

[4]许斗斗. 马克思哲学的现实性和彻底性转向——马克思《〈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新探[J]. 学术研究,2013(4).

[5]赵家祥. 《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史上的地位[J]. 学术与探索,2012(6).

[6]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84.

[责任编辑 孙景峰]